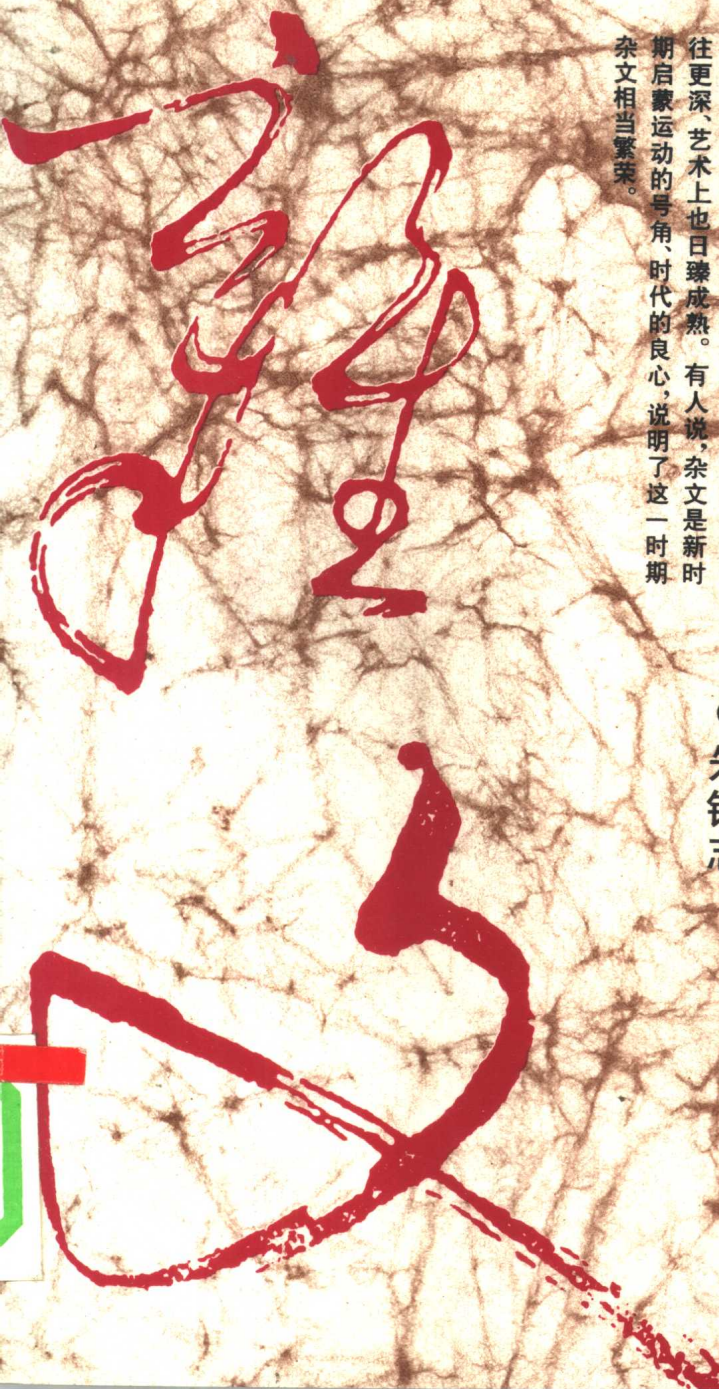


中国杂文大观

四

本卷选收一九七六年—一九八九年，共一百五十二位作家的一百八十六篇作品。新时期的杂文成就更显著，经历了十年坎坷后，杂文的思考比以往更深，艺术上也日臻成熟。有人说，杂文是新时期启蒙运动的号角，时代的良心，说明了这一时期杂文相当繁荣。

● 牧 惠
● 朱铁志
编



牧 惠 朱铁志 编

中国杂文大观^④

ZHONGGUO ZAWEN DAGUAN

百花文艺出版社

〔津〕新登字(90)002 号

中国杂文大观

四

牧 惠 朱铁志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9 1/2 插页 4 字数 410000

1994 年 3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4 次印刷

印数 14001--24000

ISBN 7-5306-1465-7/I. 1328 定价:15.40 元

出版说明

杂文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相当高的地位。五四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现代作家，将杂文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峰。新时期以来，杂文创作成就斐然，蔚为大观。有人说，杂文是批评的武器，而同时也是改革的武器，精神文明建设的武器。为了继承和弘扬这一宝贵的文学传统，满足广大读者喜爱杂文的要求，我们编辑了这套《中国杂文大观》。

《中国杂文大观》按文学发展的阶段分为四卷出版：第一卷（1918—1937），第二卷（1937—1949），第三卷（1949—1966），第四卷（1978—1989）。分别由张华、姚春树、蓝翎、牧惠主编。

“中国杂文大观”主要收各个时期的艺术杂文，包括思想随笔，哲理寓言等。题材广泛，体式多样，风格斑斓多姿。

本书在编选上得到许多学者、专家的支持，又蒙张华、姚春树、蓝翎、牧惠四位先生为各卷作序，在此一并表示深切感谢。

百花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四月

序 言

牧 惠

—

从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帮”起，到一九八九年首届优秀散文、杂文授奖会在无锡召开这十来年的杂文，我们简称之为新时期杂文。我和朱铁志合作编辑的这本书收集的就是这个时期的杂文作品。在这段期间内，文艺创作空前繁荣，杂文创作也可以说是大丰收的十年。严秀在《〈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杂文集〉导言》中说，解放以后“四十年中，真正有点像样的杂文呈现出来的，不过是1956—1957年的大半年，1961—1962年的约一年半，加上1979—1989的十来年，即一共有十三、四年时间是杂文比较兴旺的时期”。“这当中最后的十年规模最大，时间最长，作者最多，佳作也不少”。严秀还引用了唐骏在1989年春答《人民日报》记者的一段话：

我平时对这两种文体（指散文与杂文——引者）比较关注，这次参予评奖又阅读了包括散文和杂文的60多本集子，我觉得新时期的散文和杂文确实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可以这样说：比起鲁迅时代，比起建国后至1978年这一时期，新时期的散文和杂文都有突破。我个人认为杂文比散文突破得更多一些（4月20日《人民日报》）。

主持实际工作的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集)杂文(集)评奖委员会副主任苏予在答《文艺报》记者时也说：

杂文比散文成就更显著。经历了几十年坎坷后，杂文的思考比以往更深。有人说杂文是新时期启蒙运动的号角，是时代的良心。以《三家村文集》和《当代杂文选粹》为代表的杂文说明了新时期杂文的繁荣……(1月28日《文艺报》)

当时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唐达成在无锡授奖、研讨会的开幕词中也认为新时期杂文的成就比散文更为突出。它以其思想深邃、忧国忧民、爱憎分明、针砭时弊而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以邵燕祥为代表的一批杂文家的杂文，体现了作家主体意识的觉醒和中国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格力量，显示了人民作家的良心和胆识。(5月2日《人民日报》)

当然，这只能是一种意见。是是非非，最有权威的是读者，是历史。

二

漫画家廖冰兄有过一幅百读不厌的漫画，画的是两旁各半片刚刚打破的瓮，中间蹲着那位在瓮中一困二十年的廖冰兄，全身呈蚕蛹状，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那双惊惧疑虑不知所措的眼睛。画上写着：“四凶覆灭后写此自嘲并嘲与我相类者。”这幅画的典型意义在于廖冰兄写出了自己和一个历史时代的知识分子。本来思想被禁锢了几十年，“臣罪当诛兮吾皇圣明”经念惯了，有用的货色不多，经作者、编辑、总编辑层层加码地七折八扣，可以在报上说的话还剩下几句？因此，开头一两年，打得响的杂文实在不好找。

真正打响第一炮的，是老将秦牧的《鬣狗的风格》。文章描述

了鬣狗的猥琐德性，由此而谈到在“四人帮”横行中国时着实出现了一批鬣狗式的人物。

鬣狗和他们主子的种种既横蛮又愚昧的种种罪行，始终是杂文家控诉的目标。岑桑《太阳的故事》让人们知道，在神圣不可侵犯的“太阳”这个字眼下，有多少人莫名其妙地蒙冤受屈。而张志新就义之前竟被割断喉管这件愚昧加凶残的丑事一经见诸报端，全国各地几乎都有文章予以声讨。由于篇幅限制，这里只选了虞丹的一篇。陆文夫《奇特的问候》则又从另一个侧面写出这场浩劫给人们、特别是文艺界带来的灾难深广。

光是揭露、控诉，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探讨“文革”这种外国人和咱们后代人都会视为发疯的年头得以产生而且延续了十年的原因。杂文家们也积极地参与了研究的行列。他们指出，“文革”是失去了脑袋的十年。（陈虞孙：“还我头来！”）。而脑袋之所以失去，是“文革”前十七年对知识、知识分子仇视和禁锢的必然结果。在把德国音乐家贝多芬和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混为一人的首长们领导下，人们明知那是错字也不敢改过来以至跟着错下去（陶雄：《从颜渊想到的》），而“扯虎皮当大旗，披的是名为‘马列主义’华袂”的凡是派提倡迷信，提倡盲从，推行“愚民政策”也有很大的功劳。当务之急，“是狠下一番发掘、打扫工夫，大家遇事多动一动脑筋，通过革命实践，用科学的巨手去揭去他们身上披挂的那套‘法衣’”（吕剑：《论古人未必迷信而今人未必不迷信》）。

思想一开了窍，《国际歌》同《东方红》的矛盾和个中内情，先后被周修睦、吴有恒拆穿了。吴有恒的文章发表后，转载甚多。人们从中知道，《东方红》这首歌产生和变质的过程，也即是某些人有意作伪，把人神化的过程。

写到这里，我得介绍一下收入本集的恽逸群《略谈“个人崇

拜”》。“恽逸群同志，是二十年代的党员，武装起义他领导过，敌伪阵营他也打入过，知识学问非常渊博。解放两三年后他就被一股蛮不讲理的极左风潮开除党籍，过了三、四年后又被捕入狱，‘文革’后期被弄到苏北阜宁县一中学管理图书。打倒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他被调回南京，几年后病逝。他的一切罪名自然已经全部平反。”（严秀）在“文革”后期，他“位卑未敢忘忧国”，写了一批在当时完全可能因此被定为“反革命”甚至被枪毙的文章。这里只选用他一篇，让读者们见识一下什么才是中国的脊梁。

在浩浩荡荡的解放思想运动中，尽管仍然有人持保留乃至反对的态度，多年来被遗忘的封建与愚昧这号中国最主要、最不容易彻底消灭的思想敌人被重新推上了审判台。邵燕祥《切不可巴望“好皇帝”》应当说是最明确的第一声。几千年来，中国人总是把希望寄托在出真龙天子即好皇帝；好皇帝求不到，则希望哪怕自己能遇上一位“包青天”；“青天”也求之不得，最后只好把命运交给神仙菩萨，希望来个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这一点，毛泽东指出过，邓小平也谈到过；但是，由于根深蒂固，远远不是一两篇文章，也不是一两场讨论可以解决。何况，自从土地改革完成之后，我们被告知，主要的敌人已不是封建主义而是张牙舞爪等待复辟的资本主义呢！

封建愚昧得以畅行无阻，很大程度又与它以革命、“左”的面目出现有关。秦似《漫谈左右》和吴祖光《“右”辩》从这方面揭穿它的老底。长期以来，流行着一种“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拜左教”。这种“拜左教”的一大成果，就是“文革”的极左大灾难。

人们还从各种不同的方面、各个不同的角度揭示封建主义的愚昧和丑陋。王若水《“法权”和特权》剖析张春桥反对“资产阶级法权”，不仅谬误百出，而且目的是维护封建阶级特权。蓝翎的

《拉祖配》，舒展的《处级和尚》……光是它们的题目，就已经揭示出封建主义幽灵的怪诞。从一个个具体事例揭封建主义老底的文章，包括清除自己灵魂中封建主义的毒气和鬼气的杂文，本书收入了不少，因为篇幅关系而无法收入的更多。

“文革”一方面暴露了中国国民性确有严重的封建迷信病毒，一方面又给人性中最卑劣肮脏的沉渣以镀金的外貌而使之得以发扬，那结果是整个民族的道德素质严重下降。在最最最革命的口号掩护下，以权谋私、勾心斗角、贪污受贿、腐化堕落迅速蔓延开来。“四人帮”被粉碎后，他们的余党或被送进监狱，或改头换面找到了新主子，社会风气一度稍有好转。但是，隔不多久，这股腐朽的细菌就找到了附身之处。改革开放一来，封建特权更是很快就同资本主义的唯利是图找到了共同的语言。更加危险的是，被卷入的，除了潜伏的“三种人”或准“三种人”外，还有昔日“三种人”的批斗对象。后一种人在一度失去权力的磨难中，倍感权力的重要和“过期作废”的严酷教训，于是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和誓言，趁着自己复出的机会，把过去失掉的加倍地夺取回来。这是很让刚从“四人帮”魔掌下解放出来的老百姓失望的。老烈的《小花还活着吗？》呼唤出人民对小花和她们同时代人灵魂的觉醒：“有人忘记了小花，忘记了在一条战壕里倒在自己身旁的战友，忘记了自己为之艰苦奋斗的革命事业，蝇营狗苟，只想着‘乌纱帽’、‘大红袍’。”这篇文章发表于1980年4月，如果不是最早，恐怕也应当说是较早对“对不起小花”的人的警告吧？反腐败的杂文，可以说贯串了整整十年仍方兴未艾。

由于开放改革，大陆加强了同香港、澳门、台湾的联系，文艺方面的接触也相应地有了开始和发展。在这本集子里，由于我们掌握的材料有限，港澳作家只收了曾敏之，台湾作家只收了柏

杨、李敖、龙应台的作品，这是一个缺陷，我们希望有机会弥补。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作品，在大陆都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

杂文家在这十年里忠于职守，无愧于鲁迅继承人的身份。在许多重大事件和重大问题上，杂文家大都是率先站出来说话的人民代言人。在这里，不要说一一介绍，即使一一列举，也很难不挂一漏万。我们在选编这本书时，力求充分反映这种盛况；但是，由于篇幅限制，往往是只能选择其中一篇、两篇而无法更充分。关于“歌德”与“缺德”的讨论，严秀在《新文艺大系》中编入的计有五篇二万余言，我们这里只能选廖沫沙的一篇。有一些问题，例如“蛇口风波”等等，由于包括篇幅限制在内的种种原因，干脆一篇也没有选入。这种遗憾，也许将来可以出一本更厚的选集来弥补吧。

三

最近出版的一期《随笔》(1992年第3期)上梁秉堃的《解答带来了沉重》，是一篇很有分量的文章。文章谈的是曹禺。1983年春天，曹禺把画家黄永玉给他的信读给美国著名剧作家、《推销员之死》作者阿瑟·米勒听。信中说：“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了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你泥濘于在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像晚上喝了浓茶清醒于混沌之中。命题不巩固，不缜密，演绎、分析得不透彻。过去数不尽的精妙的休止符、节拍、冷热、快慢的安排，那一箩一筐的隽语都消失了。”客人不懂曹禺这一手是什么意思，陪客人的梁秉堃懂得这封信是敲打在曹禺心上一把无情的铁锤，促使他回顾后半生的创作道路。果然，经过一段时间思考后，曹禺说了一番话：

我七十七岁了，后悔读书读得杂，读得乱，好像没有读透过一本书。解放后，总是搞运动，从批判《武训传》开始，运动没有中断过。虽然，我没当上右派，但也是把我的心弄得都不敢跳动了。

做人真是难啊！……《王佐断臂》这个故事还是挺耐人寻思的。明白了，人也残废了，大好的光阴也浪费了。

平心而论，黄永玉对曹禺的指责过重了一些，把责任都推到曹禺头上，显得有“责备贤者”的过头之处。除此而外，曹禺的遭遇很有代表性。回顾一下解放以来这四十年的文艺界状况，在解放前已经有过卓越成就、写出过不少优秀作品的作家，在解放后十有八九是成绩平平，有如黄永玉形容的一个个似乎都像贾宝玉失去通灵宝玉之后那样没了灵性。这当然不是作家本人的过错。

因此，巴金在“文革”后终于写出了一厚本《随想录》，确是在文学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盛事。巴金早年写出的《家》、《春》、《秋》等一批热情奔放、爱憎鲜明的小说，曾经启发过我们当中许多人迷惘的心灵，促使我们前进，走上革命的道路。解放后，巴金也写过一些作品；但是，请恕我无礼直言，除了一些杂文偶尔讲出一些人民的心里话外，不少作品也与黄永玉评曹禺作品的话相似。有什么办法呢？在“文艺红线”的统治下，加上柯庆施、张春桥、姚文元的鞭子时时在头上飞舞，“不枪毙就是落实政策”，还能要求巴金写出像《家》、《春》、《秋》那样的作品来吗？只是在打倒了“四人帮”，人们从噩梦中惊醒过来，“左”的那一套开始被唾弃了，才有了产生《随想录》的社会条件。

《随想录》是新时期杂文的一座高峰，它肯定是一本不朽的书。在这本书里，充满了对“文革”时代灭绝人性的封建法西斯主义的控诉，严格地剖析自己、鞭挞自己灵魂中的毒气和鬼气，号召并且带头讲真话，诚如评论家陈丹晨所说，《随想录》作为一代

知识分子的觉醒和痛苦的思考的结晶,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必将受到后人的注意和研究,尽管有人挑剔和讨厌,《随想录》却不会消失。

如果说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杀伐了一切作家的灵性,恐怕也未必确切;运动也会造就出意想不到的作家。

以创作年龄计,七十以上的算老杂文家,那么,六十上下的这一批,可称为中年杂文家。这批杂文家,可以说是杂文界的主力。把他们的名字开列出来,可以是一大串。反正作品在,这里就不再在名单学上费功夫了。只想谈谈这批杂文家的代表邵燕祥。

邵燕祥在解放前就开始创作,五十年代已是一位颇有名气的青年诗人;但是,他和一批有思想、有见解的知识分子一样,在那样的年头必然会“扩大”进“分子”中去。从此,他被列入“另册”达二十多年。他重新出现在中国文坛的时候,引人注目的似已不是他的诗而是杂文了。诗人而转向杂文,邵燕祥不是唯一的;但是,成就最大的是邵燕祥。也许是诗人的素质在起作用,邵燕祥的杂文相当多是美文。娓娓道来,妙句连篇,像散文诗。

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些美文中所体现出邵燕祥的思想和人格。何西来说得好,“邵燕祥很看重一个人的人格,推而广之,及于党格、国格”。“他的杂文被称道,也主要在于格调和风骨,在于从此中透出的真情性、真人格。他崇理性、重真诚、有胆识。”

与其语焉不详,不如略而不谈,广大杂文家的不同风格,不同成就,这里就不去谈它了。

四

在杂文史上,乐秀良的《日记何罪!》带来的后果很值得记上一笔。

1979年8月4日和11月21日,乐秀良在《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两篇反对以日记定人罪名的文章:日记的内容是不公开的,即使有某些偏激或错误之处,它一无宣传,二无流毒,三无影响,四无不良后果,构不成犯罪和刑事责任。因日记被抄家、批斗、判刑的冤案应当彻底平反!法律应当保障公民记日记的权利,保证日记的作者不再成为思想犯!文章的道理最浅明不过;但是,在民主与法制得不到保障的无法无天的形势下,一篇日记可以使人从此不得翻身的事情何止万千。乐秀良的文章端的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全国十八个省市给他寄去三百多封信,一字一泪地向乐秀良倾诉自己或别人因日记而罹罪长期得不到平反的事实,向作者伸出了求援的手。乐秀良尽自己的可能,帮助一些人果然得到平反,同他们建立起深厚的情谊。

“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廖沫沙)。谁也不会相信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神话。乐秀良这两篇杂文竟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已经很出人意料之外了。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那就是对发表在《河北文艺》上的《“歌德”与“缺德”》的批评。这是一篇“帮”味十足的鸣鞭文字、杀气腾腾地挥向刚从“四人帮”的锁链中解脱出来的文艺家。它警告:如今已是太平盛世,“中国人并无失学失业之忧,也无无衣无食之虑,日不怕盗贼执仗行凶,夜不怕黑布蒙面大汉轻轻叩门。河水涣涣,莲荷盈盈,绿水新池,艳阳高照”。面对如此美好的社会主义不去“歌德”,就是“到历史垃圾堆上的修正主义大师们的腐尸中充当虫蛆”,“在阴湿的血污中闻腥的动物”。这篇文章生不逢时,发表之后马上遭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杂文家的强烈反击。那结果却出乎杂文家们的意料之外,这位力主“歌德”的作者,很快就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竟接连写了几篇他批为“缺

德”派的正经点的作家不屑一为，确实缺乏基本道德准则的肮脏小说，成了一个不打引号的缺德派。章明在《剑花小集·关于“歌德”及其他》的附记中说得好：“此事极其鲜明而生动地告诉我们：某些打着极左旗号的人，是可以在一夜之间又以‘自由化’的面目出现的，但看早晚时价不同、各样货色齐备。”它告诉我们，“左”派中除了那些虔诚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还值得同情的左倾教条主义之外，还有一种披着马列主义外衣却根本并不笃信马列主义、仅仅把它当作一种登龙术的人品卑劣的政治倒爷。

正因为这样，杂文往往为那些把黑暗当作光明的人所讨厌。新时期的杂文史，不少这类因揭露某些人的疮疤而被讨伐的事情。

“文革”结束，“四人帮”及其余党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被斥为鬣狗，犹太，法西斯……刚刚开始，他们或被下令“讲清楚”仍缓不过气来，或者惶惶不可终日地躲在一边听候宣判，1982年，他们认定大概大难已过，于是对林放的《江东子弟今犹在》不客气了，文章发表当天，编辑接到了恐吓电话，让作者“要小心点”。这是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的“江东子弟”的反扑声，说明确有仍未肃清的“四人帮”爪牙，而且准备卷土重来。这是林放的光荣。

同《江东子弟今犹在》比，章明的《吃运动饭》的遭遇更具有典型性。

这篇在1980年5月14日发表的文章，无非是揭示在干部队伍中有着一种“平时一条虫，运动一条龙”专靠吃运动饭为生的人，把他们的丑态描述一番而已。这类人，当然包括“文革”中的三种人；但又不仅仅是他们，而是“那些接二连三、层出不穷、翻云覆雨、有害无益的政治运动”中培养出来的以整人为职业的

“运动健将”也即是秦牧笔下的鬣狗。

这种“不准讨论”的怪事，明明暗暗的，不知多少。耿庸《这话有待驳倒》就举出很多例子。但是，不准讨论的命令尽管下，杂文家仍有意或无意地参加这场讨论。例如说，冯英子的《差役哪里去了？》和《打、砸、抢以外》，高扬的《论诬告》，周修睦的《“读圣贤书，所为何事？”》，朱春山的《“整人”诗话》，周声华的《“要是以后变了”》，樊篱的《不可等闲视之》，都可以说是对过去吃运动饭、今后仍打算吃运动饭的“运动健将”们的批判，同时也是对广言“大批判”的回答。

如果不谈谈巴金《随想录》的被批判，对新时期杂文界和文艺界、思想界的概况将是很大的一个遗缺。

《随想录》得到中外广大读者的喜爱，这一方面，从它的一再重印，从在上海书市上它的畅销和一位女工以非常高的价钱购买这本书的热烈动人情景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巴金说，与此同时，《随想录》在香港《大公报·大公园》发表，“连载不到十几篇，就有各种各类叽叽喳喳传到我的耳里。有人扬言我在香港发表文章犯了错误；朋友从北京来信说是上海要对我进行批评；还有人在某种场合宣传我坚持‘不同政见’。”巴金的这番话当然不是庸人自扰，比他所说的更严重的讨伐有的是。

为什么巴金的《随想录》那么招恨呢？巴金也明白：“因为我要人们牢牢记住‘文革’。”“他们不让建立‘文革博物馆’，有的人甚至不许谈论‘文革’，要大家都忘记在我们国土上发生过的那些事情”。

巴金的话也对也不对。仇恨巴金的，有人并不想大家忘记“文革”，而是千方百计为“文革”歌功颂德，唱样板戏是一回，“红太阳”也热闹过一阵，还有人开座谈会让当年的上山下乡知识青

年谈与工农相结合的丰硕成果，甚至说“文革”揪走资派是对的，资产阶级确在党内，只是不该层层揪而已……。他们要人忘记的，是在“文革”中发生过的种种丑恶。

至于写“文革”的问题，应该说现在不是写得太多，而是写得太少，写得极不够。“文革”这段“史无前例”的历史现象，亟需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一代又一代不断反复总结、反思。这是无法回避的，也是不得不正视的痛苦事实。何况，“文革”的幽魂未必完全消失。为“文革”英雄张目的事情何尝没有，袭用“文革”故伎的也不乏其人。因此，“文革”就是“最现实的是非风云”之一。

六十年代初期，巴金曾经忍无可忍地说了一次真话，那就是他在上海文艺界一次会上以《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为题的讲话，巴金自我批评“讲得多，写得少”，“缺乏勇气，责任心不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原因是害怕“言多必失”，招来麻烦。“我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握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他们今天说这篇文章歪曲某一种人的形象，明天又说那一位作家诬蔑了我们新社会的生活，好像我们伟大祖国只属于他们极少数的人，没有他们点头，谁也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仅仅讲了这几句真话，当时的上海皇帝柯庆施就大发雷霆，姚文元之流拿着棍子等着。“文革”一来，这番真话连同他的“反革命的《激流三部曲》”一起，成了“不枪毙他就是落实政策”的罪证。

“文革”之后，讲真话也并不那么容易。就“目前最现实的是非风云，及那些最不能使一般青年明白的现象，哪怕发表点滴‘真话’”，也是谈何容易。巴金讲得很清楚：我所谓真话不是指真理，也不是指正确的话，自己想什么就讲什么；自己怎么想就怎么说。但是，十年之后的1991—1992年，仍有人在那里喋喋不休

地教导包括巴金在内的人们，“说的符合实际，不夸大，不缩小，没有片面性”，才叫讲真话！“真话不但要出乎真心，而且要合乎实情”，“真假就不能以你是否真心而只能以客观实在去检定”。你看，讲真话还有那么严格的律令在！你敢乱讲真话吗？需知，“检定”权可是握在他们手里。你说大跃进搞糟了，这不是真话。因为根据他的“客观实在去检定”，“大跃进”成绩很大很大很大。你说“文革”必须全盘否定，这不是真话。根据他的“客观实在去检定”，“文革”中有两条路线斗争，经济还是有所发展。于是，人们只好在家里讲真话，在单位里讲笑话，在会场里讲假话。

邓小平同志说，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仅仅从讲真话这一个小小的问题所引出的绕口令式的条条框框，也可以证明他看得多么准确。

这一时期在杂文理论上的分歧，较为值得注意的是一种建立在鲁迅过时论基础上的新基调论。一位新基调的热情拥护者欢呼，除了伟大的“新基调”外，从鲁迅那时起到八十年代“这几十年间，杂文界没有出现过重大理论问题！”

“新基调”的提出，则把杂文理论研讨的进程推上了一步，犹如在平静的深潭里投了一块巨石（作者则自称是“抛砖”），其声响，其水柱，把人们目光吸引到当代杂文理论探讨中来，并激起了波澜回荡，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撼动着人心。

这段文字，发表在“新基调”发明人主编的一个刊物上，因此有必要抄下来让大家见识见识。

虽然不是几百年才出一个，也是几十年才出一个的理论家，即使不能说“最最最最”，至少也得用上一两个“最”字的伟大理论家了。瞿秋白呢？巴人呢？聂绀弩呢？夏衍呢？唐弢呢？……他们有关杂文的理论，均不属“重大理论问题”？居然有人说